

四川大学档案学系 编

Dang an xue lun cong



档案学论丛

四川大学出版社

档案学论丛

第三集

四川大学档案学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丽莉

封面设计：蒋仲文

档案学论丛

四川大学档案学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德阳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8.06 字数168千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册

ISBN7-5614-0314-3/G·29 定价：2.80元

目 录

- 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陈贤华(1)
- 论档案的一般定义……………乔健(17)
- 略论档案的利用与保密……………刘承志(42)
- 档案文献编辑论纲……………黄存勳(52)
- 略论文书学的学科归属……………雷荣广(70)
- 机关文书工作分类组织初探……………杨戎(84)
- 明清档案价值浅析……………倪道善(101)
- 清代奏折制度与君主专制……………姚乐野(116)
- 清代兵制概述……………罗辉映(131)
- 浅论科技文件材料的标准化……………何玲(157)
- 档案鉴定工作三题……………陈贤华(167)
- 碳素材料所书字迹稳定性探讨……………杜庆坪(176)
- 试论档案部门的形象树立问题
- 档案工作与公共关系再探……………杨力壮(181)
- 关于档案、图书、情报一体化的思考……………陈丽(194)
- 浅议苏联档案文件价值鉴定……………黄远咏(207)
- 苏联各地遵照苏共二十七次决议加速发展
和改革档案工作……………陶竹芳译(217)
- 美国的档案工作者和社会历史学者……………刘文杰译(230)
- 试评《档案文献学》……………徐晓炜(244)
- 后记……………(250)

档案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陈贤华

一、档案学研究的成就

新中国的档案学已到了不惑之年。目前档案学的发展已达到了什么程度，有何成绩和问题，理应进行一次评价，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展望未来，促进档案学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在我看来，中国档案学四十年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停滞、倒退和破坏，走过曲折的途程。但总的看来，还是从无到有，由浅到深，由点到面，由粗到细，由稚嫩到逐渐成熟的上升发展过程。新中国的档案学几乎是在一片空地上形成和创建的。开初只有中国人民大学一个点从事档案学理论的探索，仅有一家档案业务内部刊物。1951年第一次档案学的讨论题是：档案与资料的区别。是比较粗浅和幼稚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开学以后，竟没有一个中国的档案学教师，没有一本档案学的教材，没有一个档案学的研究组织，许多人甚至不知档案学为何物。新中国的档案学就是从这样的空地上起步的。经过四十年发展，档案学已经成长、壮大了。结束了它幼稚、粗浅的阶段，日渐趋向提高和深入。呈现出勃勃生机、兴旺

发达的景象。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档案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档案学也恢复起来，空前繁荣，成果累累，这是建国以来档案学研究最兴旺的时期”。^①

在我看来，档案学四十年发展的成就可以概括有以下几项：

（一）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已经成长起来了，这见于党和国家的文件^②，载于国家的两次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③，几十所高等学校办起档案专业教育，也足以证明档案学的独立科学地位获得了普遍承认。这个独立科学地位的取得，是40年档案学建设的重要成果，表明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在世界上并不落后，比之某些外国人不承认它是一门科学^④，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二）档案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多数人已承认档案学是由理论档案学与应用档案学两大部分构成^⑤。对理论档案学或档案学基本理论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产生了一些颇有水平的档案学理论著作，如吴宝康主编的《档案学概论》、《当代中国档案学论》、《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邹家炜等著的《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简史》，以及即将出版的《档案学词典》、《大百科全书·档案卷》^⑥等。这些著作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使同外国的某些档案学著作相比也不逊色。

（三）档案学的研究已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已经突破了仅研究传统的历史档案的范畴，已扩展到了研究科技档案、各种专门档案、档案与文书的关系、档案与图书、情报的关系；不仅研究古老的甲骨、金石、简牍、缣帛档案，也研究新型载体的磁带、胶片、光盘等档案；既研究传统的管理方

法，也开展了现代化管理的研究；既有对档案室工作的研究，又有对档案馆工作的研究；既研究档案的管理整理分类理论，也研究档案的利用理论；既有微观的研究，又有宏观的研究；既学习、借鉴苏联档案学，也介绍、传播欧美档案学。

（四）档案学术之繁荣是令人欣喜的。档案学术组织从全国到各省市（有的省直到县区）以及某些专业系统，都有档案学会和档案学研究机构；档案学刊物全国的，地方的以及专业系统的，达五六十种之多；研究队伍已形成老中青相结合、专家与群众相结合的一支大军；学术活动全国的、地方的、专业系统的都在开展，不胜枚举。全国还有一个专业化的档案出版社，这也是外国所罕见的。我国已同国际档案界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档案工作与档案学术交流。我国档案学术这种繁荣和活跃的情景，不仅在旧中国不敢想像，就是放眼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五）档案教育蓬勃发展。1987年全国有39所普通高等院校办有档案专业教育（包括本科、大专、干部专修）、在校生4947人。43所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函授、电大、业大）有档案专业学生27541人。有档案中等学校（中专、职业高中）78所，在校生7610人^①。在人大、川大等少数大学，还培养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档案教育的发展是档案学发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档案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

（六）档案学研究的方法有重要的突破。中国社会主义档案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过去，我们强调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既是档案学的指导思想，又是

最一般的研究方法，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分析比较的方法，以及历史方法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坚持。近几年以来，档案学研究引用新的方法有相当成绩。如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应用，对模糊数学方法和综合评判方法的探索，借鉴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某些方法等。突出地、集中地表现在《档案学概论》、《当代中国档案学论》等著作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信息观念对档案学的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开发档案信息，服务四化建设”已成为档案学研究，档案工作的热门话题。

（七）档案学的许多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了。如档案的定义、作用及其本质属性、档案的起源、档案的全宗理论、档案的价值观、档案工作的矛盾和规律等问题的研究，比五十年代深入多了。有些问题虽有不同观点的争论，这正体现了学术自由和民主。即使是档案应用理论研究，也有相当拓展，如形成学科较早的档案管理学，如果仔细比较一下陈兆祺同志编著的《档案管理学》（1962年版）、陈兆祺和吴宝荣主编的《档案管理学基础》这两本书。就会发现这两者并非只是“浓缩本”与“膨胀本”的区别，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都有相当变化。

（八）档案保护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仅1984年至1988年4年中，出版著作4本，译著1本，参考书2本，论文526篇，经过鉴定的研究成果有13项，其中有获得1986年国家发明协会铜牌奖的温湿度自动控制仪，获1988年北京国际发明展览银牌奖的蓝黑墨水字迹恢复剂等^⑧。当然我国的档案保护技术受制于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条件，

在世界上是不算先进的，但同旧中国相比，无疑有天壤之别。

二、当前档案学研究出现的问题

档案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成就，发展的形势也是好的，但并非尽如人意，也有问题和不足，有学术水平的问题，也有学风问题，也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映，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

前段时间，我读到档案学某些文章，深感困惑和不安。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反思”之名，对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回顾和评价。有些作者从社会文化背景去反思现代档案学的得失，是有益的，也代表了目前学术界的一种新潮流，其愿望和出发点是好的。但他们比较忽视对历史事实的尊重。因而对四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估计偏低^⑨，而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又看得过于严重，在学风上则表现为不够谨严。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档案学中也有反映。正如国家档案局所指出的：“由于多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一直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政治思想教育失误。特别是赵紫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实际上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消极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以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这种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档案部门和档案工作人员。……在档案学理论研究中也有某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不够的现象等。”^⑩这种估计是正确的。比如《河殇》思想在档案学界就有市场。以少数所谓“精英”人物苏晓康等所炮制的《河殇》，贯串着民族虚无

主义的思想，把中国几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笔钩销。这样的人物和作品在档案界有人欣赏、叫好，有人模仿它的文风、词语写文章。有一篇文章说：“我们看1988年的档案学研究，并没奢望档案界出一部《河殇》之类的轰动之作，出一位苏晓康之类的新闻人物。”^⑩文章的作者对档案界没有出现《河殇》和苏晓康之类的作品和人物深为惋惜。比如《河殇》里大谈“黄水”、“黄土”、“黄米”、“黄皮肤”，把这都当作中国文化落后无望的标志，这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污蔑。在档案学里也有人借用“黄土地”^⑪做作文章。这不就证明了《河殇》对档案学的影响吗？

下面，我着重讲一讲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问题。

（一）怀疑和否定我国档案工作的管理体制。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档案工作逐渐形成了党政档案工作集中统一管理体制。这项体制是我国法律制度和党的文件所明确规定的，是档案管理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三十多年的实践已完全证明，这项体制和制度是正确的。我国档案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正是在这个体制和原则指导下取得的。可是现在有人说：“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它并不是真正地加强了党对档案工作的领导，相反，使党陷入日常的具体的档案事务之中，分散了党的精力，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党政档案管理机构合并以来，并不是推动、加速而是限制、延缓了档案事业的发展，实际上使党、政两边的档案工作都分别受到了影响。”又说：这种体制“已经与今天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不仅应予调整，而且应因势利导，予以改革。”^⑫

怎么改革呢？这位同志提出二点建议：（1）党政档案

工作“分头发展”。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随着党政职能逐渐分开的实施，党政档案管理机构迟早以分设为好……道理很简单，党和政的性质不一样，职能不一样，合在一起，人员不够，精力有限，工作只好粗粗拉拉大呼隆。分开之后，工作才能抓深抓好^④。”（2）党团档案从一个机关里分离出来。“一个机关单位党、政、工、团的档案，是否还需要作为一个全宗，统一由该机关的档案室管理，也需要具体分析，具体研究。看来，除了工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其档案仍是该单位全部档案的一部分外，党、团组织形成的档案已不再是该单位不可分割的档案，可以考虑实行定期向上级党、团机关上交归档的办法。”^⑤

这里就提出了两个严肃的问题。（1）党政档案工作统一管理的体制究竟对不对？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基本上不成功的”？党政档案工作是否应该按照“分头发展”的路子去改革？（2）一个机关单位的档案是否允许分散？（一个机关党团组织形成的档案上交上级党团机关，一个机关的档案不就分割、肢解了吗？）同一全宗的档案不容分散，不同全宗的档案不能相混的全宗原则还要不要坚持？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党政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是我国档案工作的一项根本制度，已被我国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因而不应怀疑、不容否定。党政档案分两个系统的建立和发展的意见，既无理论依据又难以实行的。现在全国有2800个政府档案局，3000多个档案馆，实行分头发展，再建2800个党的档案局和3000个党的档案

馆，这既无必要更无可能。“分头发展论”是根本行不通的空想。

把党团组织形成的档案从一个机关里分离出去，就是破坏档案的全宗理论原则，也违背了保持档案历史联系的原则，因而不可取。不论政治体制怎么改革，党组织在机关单位的战斗堡垒作用不会变，党组织的活动仍然是该单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团组织的档案仍然是该单位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二）对文革前十七年档案学的成就估计过低，有“经验档案学”之说。“文革”前十七年是新中国档案学形成与创建的初期。如果读一读人大档案系集体编写的《档案学基础》（1960年内部材料，共50万字）、陈兆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1962年出版）、吴宝康的《关于档案学问题》（1957年）、《档案学专题讲授大纲》（1958年）、《关于档案工作矛盾问题的探讨》（1962年）等论著（均见《论档案学与档案事业》）以及曾三、裴桐等人的讲话、报告、文章，党和政府有关档案工作的决定、条例等，不难发现，前十七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已产生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理论性论著，对档案学研究的对象、任务、范围均已明确。有些理论问题（如档案工作的矛盾问题）已达到相当深度。然而有人不了解或不顾及历史事实，把前十七年的档案学贬称“经验档案学”。比如有文章称：“纵观十七年的档案学，在理论上最大的缺陷，就是尚未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而是建立了一个实用经验系统。”“在十七年里，没有形成一部成熟的档案学基础理论性著作，整个档案学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档案学界是在对档案学

的对象、范围、任务、方法等都不甚明确的情况下，进行着档案学研究。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是经验的积累，可以称之为‘经验档案学’。”^⑩这个估计显然是贬低了前十七年的档案学成就，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因而是错误的。

（三）对档案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有文章说：“档案学研究中潜藏着种种危机，很多档案学文章味同嚼蜡，既没有理论思辨的快乐，也没有对工作实践的启迪；学理变成了说教，科学论证为先验规定所代替；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文章更是随处可见。”^⑪又有人说：“我国的档案学理论，既没有充分而正确地说明纷繁复杂的客观档案事物，也没有在改造客观世界上更多的更新的理论建树。”说档案学内容“陈旧”、“名大实空”、“是荒芜干涸的黄土地。一片宁静，莽莽苍苍”。据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历史的惯性和‘左’的混合力在档案学领域里垒起了一堵高墙。”另一个是“档案界自恃优胜”、“满足现状、自诩高明。‘优胜’代替了危机感”，又垒起了“新垒”。还有“固守”、“封闭”、“官僚主义”^⑫等等，问题是够严重的。

我认为，我国档案学发展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论著，但就整个档案学理论的深邃性与宏富性来说，比之文史哲等老学科是不免有逊色的，有些文章的水平也确有待提高，也还有薄弱环节，这是事实。但这只是一个继续提高水平的问题，并不象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么严重和潜藏着危机。一个大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主流，也有支流，甚至还可能有逆流，必须分清主次。从总体上看，档案学近十年来发展势头良好，是令人鼓舞的。当然，有些问

题、有些地方、有些文章，也会存在如引文所说的情况，但这不代表档案学发展的主流，同时档案学水平的高低深浅是相对的，有一个怎么比较的问题。我赞同吴宝康先生“又高又不高”的总评价。同旧中国档案学比较，现在的水平是高的；同外国相比较，我国的理论体系是先进的，落后的是现代化管理方面。^⑩

（四）档案学史分期存在着明显的歧见。人民大学出版的《档案学概论》（第16章第4节）中的分期，影响较大，档案学界多数人是接受的。现在，寒江同志别立新帜，提出中国档案学史的四分法。寒江同志说：“纵观中国五十多年的档案学发展史，不难看到，在1950年，1960年和1976年，中国档案学先后经历了三个大的转折，档案学的基础、特点，乃至性质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以三个转折为界，我们把中国档案学发展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并依据各时期档案学的主要特征，分别命名为图书馆学时代（三十年代中叶至1949年）、苏联时代（1950年至1959年）、独立时代（1960年至1976年）和繁荣时代（1977年至今）。”^⑪

这个分期和时代名称同样包含着对整个档案学发展的评价问题，而且不无偏颇。如果依据社会性质，应以新中国建立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期。即近代档案学和现代社会主义档案学，这个界限应是1949年，而不是1950年。近代档案学是一个大的历史时期，不能与建国后的三个小阶段相并列，而且把旧中国的档案学命为“图书馆学时代”也不妥当。那时的档案学，虽受图书馆的影响，但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科学，受图书馆影响较大的仅是档案分类理论，即使是档案分类理论，除了借用图书的“十进分类法”以外，也还有

“纲目分类法”、“类户分类法”和“不分类管理法”等。仅根据“十进分类法”这一点而命名为“图书馆时代”，显然不当。

把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称为“苏联时代”，同样具有片面性，因为五十年代的档案学，除接受苏联影响一面之外，也还有中国自己的东西，特别是1955年以后，在纠正了学习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之后，中国档案学走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比如195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1959年《中央关于统一管理党、政档案工作的通知》和省、县档案馆通则，1958年、1959年的档案工作方针，都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制订的，档案学中对档案工作矛盾与规律的探讨，是我国的学者对学术问题的重要探索。立卷方法，我国也有许多创造。所以把五十年代的档案学命名为“苏联时代”恐怕不当。

问题更为突出的是“独立时代”之说。我国的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一直是独立发展的，用“独立”与“非独立”来划分是不对的，寒江同志的本意大概是“独立时代”相对于“苏联时代”的。这种名称的不科学性在于不符合历史事实。尤其严重的是把“文革”十年放在“独立时代”，并称之谓“后独立时代”，同1960年——1965年的“前独立时代”相并列。还说：“后独立时代的档案学随着政治运动的开展而被迫停止研究，但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文革”十年，极“左”思潮横行，档案学研究遭到极大破坏，践踏了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搞乱了思想理论原则，哪里是仅仅“被迫停止研究”呢？“文革”十年，是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一次灾难性的

大破坏、大倒退，哪里谈得上一定程度的发展呢？寒江同志的这些提法是欠慎重的。

（五）所谓“理性精神”、“理性权威”、“先验规定”。

有同志探讨档案学发展的动力是有益的，但其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性的呼唤》一文说“八十年代开始的文化热，给了我们又一个重要的启迪，必须跳出在具体问题上就事论事的圈子，到思想文化领域去寻求推动档案学改革和发展的动力。从档案学理论的思维方式上探寻问题的症结。”文章的作者阿迪同志经过一番“寻求”以后，得出结论称：“中国的档案学从来就缺乏一种自我发展意识，一种主体意识，也就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超越政府、社会各阶层的理性权威。”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第一，推动档案学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理性精神”、“理性权威”还是社会实践？科学发展史证明，社会实践的需要产生科学、推动科学，科学则反映实践，指导实践，实践是第一性的，起决定性的作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是离不开实践的。档案学的发展史同样证明了这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因“行政效率运动”和整理、研究明清史料的实践，推动档案学的产生，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档案学同样是随着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需要产生发展。恩格斯曾说：“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开始便由生产决定的。”^②又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③其次科学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环境。近十年来，档案学兴旺发达，“其原因盖由于政治民主、学术自由、环境安定、事业发达，因而使档案学园地繁荣活

跃、成果、人才大量涌现出来”^③第三，档案学的发展也需要引进和借鉴相关科学的知识和方法。近年来，档案学研究者借鉴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对档案学的发展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离开了实践、环境和方法去谈“自我发展意识”、“主体意识”、“理性权威”，恐怕很难找到真正的发展动力。实践是最活跃的因素，常常会跑到理论的前面，呈现出某种差距，“然而这一差距，却又可以变成档案学研究和发展的一种动力。”^④

第二，什么是“理性精神”和“理性权威”呢？阿迪同志没有具体揭示，他只要求这种理性精神是“超越政府、社会各阶层的”。另一处他提到“先验规定”，对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种种规定用“先验”一词来修饰和限制，恐怕不是笔误，而是一种看法。这就使我联想到曾被列宁批驳的马赫的先验哲学，什么叫“先验”呢？按哲学上的解释是“在认识论中有先于经验的意思”，有一派哲学家“主张在人所处的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超越经验、超越时空永恒存在的理念世界。”^⑤上述“理性精神”与“理性权威”大概是从这个“理念世界”引申出来的，这同我们强调实践是推动科学发展的观念，恰恰形成明显的对照，谁是谁非，当由世人评说，不过有一点是比较肯定的：档案工作领域里的种种规定都是根据档案工作的实际需要，经过调查研究或试行，有些是经过全国档案工作会议讨论，党中央和国务院审定批准和颁发的，又指导中国档案工作的实践，这样的规定应该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怎么能说是“先验”的呢？所谓“先验规定”即是先于经验、先于实践的主观规定，这样